

 欧亚备要

王子今 著

汉简河西社会 史料研究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简河西社会史料研究

王子今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简河西社会史料研究 / 王子今著.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欧亚备要)

ISBN 978-7-100-12181-1

I. ①汉… II. ①王… III. ①社会生活—史料—河西—汉代—文集 IV. ①D69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78863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简河西社会史料研究

王子今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2181-1

2017年2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7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6 3/4 插页 1

定价: 90.00元

漢簡河西社會史料研究



编者的话

“欧亚备要”丛书所谓“欧亚”指内陆欧亚（Central Eurasia）。这是一个地理范畴，大致包括东北亚、北亚、中亚和东中欧。这一广袤地区的中央是一片大草原。在古代，由于游牧部族的活动，内陆欧亚各部（包括其周边）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有了密切的联系。因此，内陆欧亚常常被研究者视作一个整体。

尽管司马迁的《史记》已有关于内陆欧亚的丰富记载，但我国对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在很多方面长期落后于国际学界。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并开始急起直追，严格说来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当时筚路蓝缕的情景，不少人记忆犹新。

由于内陆欧亚研究难度大，早期的研究者要克服的障碍往往多于其他学科。这也体现在成果的发表方面：即使付梓，印数既少，错讹又多，再版希望渺茫，不少论著终于绝版。

有鉴于此，商务印书馆发大愿心，选择若干较优秀、尤急需者，请作者修订重印。不言而喻，这些原来分属各传统领域的著作（专著、资料、译作等）在“欧亚”的名义下汇聚在一起，有利于读者和研究者视野的开拓，其意义显然超越了单纯的再版。

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出版时期、出版单位不同，尤其是研究对象的不同，导致诸书体例上的差异，这次重新出版仅就若干大的方面做了调整，其余保持原状，无意划一，借此或可略窥本学科之发展轨迹也。

愿本丛书日积月累，为推动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起一点作用。

余太山

序

河西，因地处黄河以西而得名。古丝路在兰州以西沿北为蒙古高原，南为青藏高原的狭长走廊一直通往西域及更遥远的地方，它的开拓畅通了中原与西域乃至与中亚的联系，对亚欧文化的交流起着促进的作用，这就是著名的河西走廊。但河西的范围远大于此，汉武帝西拓，先后设立张掖郡、酒泉郡、武威郡、敦煌郡，统称河西四郡，这是行政地理意义的河西。在此范围，除了上述所见东西走向的河西走廊，还有沿古弱水从酒泉向北通往广袤蒙古高原的通道，据出土汉晋简牍所见，它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亦值得充分重视。正由于这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地位，河西成为各种文化与不同民族的交融之地，自然呈现出绚丽多彩的社会文化面貌，故吸引众多的历史学家、文学家深探研、图解密、叙情感。加之简牍及其他文献的巨量出土，极大地拓宽了学术探研之路，使研究的角度与方法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子今兄《汉简河西社会史料研究》一书，便为奇葩之一。

出土汉晋简牍为河西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活生生的第一手资料。近现代，在河西的范围内曾出土约六万枚简牍，时代从秦汉至魏晋。得益于特殊的地理与气候条件，这些简牍很好地保存下来了。其中大批量的重大发现如：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敦煌西北的烽隧遗址获简708枚；1930—1931年间，瑞典人贝格曼在额济纳河流域的大湾、地湾、破城子等地的障隧遗址获简10200枚；1972—1974年间，甘肃居延考古队于额济纳河流域破城子、第四隧、金关等遗址发掘出土简牍19637枚；1979年，甘肃文物工作队与敦煌县文化馆组成的长城调查组在敦煌西北的马圈湾遗址发掘出土简牍1217枚；1990—1992年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

掘获简 3500 余枚。河西出土简牍之大部为当时适用的行政文书，只有少量典籍。因此，就全国出土的汉代简牍而言，河西汉简是其中多样性最丰富、涉及领域最广泛的部分，与各地出土的简牍也有一定的关联。所涉机构，从亭里烽隧、郡县都尉到朝廷各部乃至皇室都有记载。悬泉汉简甚至还涉西域乃至中亚多国。所含事项则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资料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对我们了解汉代历史的动态发展极有好处，其中不少未见于传世典籍，可极大补充史载之不足。子今兄在《汉简河西社会史料研究》一书中，抓住了散乱简牍所见许多常人不易掌握的细节，从微观入手，通过归纳分析，结合传世文献所载，得出不少宏观的结论，颇多独到之处。

子今兄是秦汉史学界著名学者，凭着学术实力及个人魅力，以教授身份任多届秦汉史研究会会长，可谓全面发展：风度翩翩却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热心社会公益，据说曾多次无偿献血，有一次我们出访台湾澎湖遇到当地有空难，需要供血救人时，子今毫不犹豫地主动要求给同胞献血，令人感动；在海峡下海游泳，游出离岸甚远，体力惊人，才知其常年坚持，故能精力充沛，硕果累累，这就是本钱呀。

据不完全统计，子今兄已发表论著 30 多部，论文 600 余篇，成果超常，不仅数量多，涉及学术面亦甚广，从其近年论著书目可知一二。如《秦汉社会史论考》、《秦汉社会意识研究》、《秦汉区域文化研究》、《秦汉交通史稿》、《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研究》、《秦汉称谓研究》、《汉代儿童生活》等乃专攻秦汉史多个专门领域；《中国古代交通》、《中国社会福利史》、《交通与古代社会》等则为具通史性质的专门史；《简牍史话》专攻简牍，《门祭与门神崇拜》、《钱神：钱的民俗事状和文化象征》专攻民俗等。上述成果之研究过程为其积淀深厚的功底，近作《王子今学术经典文集》及今作《汉简河西社会史料研究》无疑为其集大成之精品。

兴趣能催生才智，子今在一则博客中说：“有条件进行自己爱重的历史学研究，也可以算是人生大事。也许最值得我暗自高兴的，是职业的择定适合于自己的兴趣，适合于自己的性格。”正是这种内在的动力，牵引着他在史学研究的道路上狂奔。可贵的是，他的努力并非是一时之激情，而是有计

划、有目的，夜以继日、艰苦卓绝、持之以恒的奋斗，故能攀登到更高处，这是值得后来者学习的。

《汉简河西社会史料研究》一书视野开阔、方法严谨，所涉及皆为史学重大课题：全面分析了汉代河西的社会环境、社会构成、社会身份、社会控制，也对前人研究河西的成果给予中肯的评价，同时准确指出河西制度与内地制度之异同。作者对传世文献的应用固然得心应手，对简牍资料的理解也有许多过人之处。因此，该书的出版不仅对秦汉史学，对简牍研究的深入也必将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李均明

2015年6月20日于北京

自序

这本《汉简河西社会史料研究》，是笔者研习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等出土文献若干心得的汇集。主题为汉代河西地方社会史研究，内容包括属于社会生活范畴的汉塞军人生活和民人生活，也包括属于社会生态的军民关系，军队中的官兵关系，以及作为影响和制约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人和自然环境的关系等。秦汉时期的社会结构研究，近年关注者有限。何兹全先生曾经告诫我们，社会史研究首先应当关注的是社会重大问题，比如社会构成、社会形态、社会阶级关系等。笔者自知理论素养薄弱，只能进行一些试探性努力。本书中关于河西“客”和“亡人”等问题的讨论，所陈浅见，愿意求教于方家。社会生活史研究，近年多受关注。河西汉简资料中提供了反映诸多当地军民生活情状的信息。现在的研究，只能说是初步的、点滴的、片断的收获。秦汉时期社会称谓研究，是笔者近年承担的研究课题，由于社会称谓及其体现的社会身份是反映社会历史文化的重要方面，自以为应当重视。河西社会处于边地，又属于新开发区，军事和外交方面承负沉重，人口构成和民族关系也非常复杂，因而行政管理也较内地特殊。从许多迹象看，当时当地的社会管理，大体是严明有序的。汉简文书的行政史料，因此也有特殊的价值。

这些文章于是分为五组：第一，汉代河西社会环境；第二，汉代河西社会构成；第三，汉代河西社会生活；第四，汉代河西社会身份；第五，汉代河西社会控制。又附录“简牍学与汉代河西社会研究的学术史”，将几篇相关学术评论收入其中。

1911年，罗振玉向正在考释新疆和甘肃所发现简牍的沙畹索取有关资

料。1912年，沙畹提供了手校本，随即罗振玉与王国维据此对所得简牍资料做释文和考证，其成果即1914年在日本京都出版的《流沙坠简》。这样说来，中国学者的河西汉简研究，到今天正好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学术史历程。这100年来，几代学者辛勤努力，若干学术大家对于这一学术主题投入心力甚多，为作者这样的后学提供了正确的导向和示范。对于为简牍出土和研究付出辛劳的甘肃考古学者和内蒙古考古学者，我们亦应深心敬佩。这本小书，对于河西汉简研究的学术壮流而言，实涓浅不足言。而后随着新学者涌现，新方法普及，新材料面世，笔者的浅陋识见，自然都将被学术新成果覆盖。一如考古地层学的探索，尽管可能终成腐朽，但后来的研究者要探知我们这个学术阶段的遗存，体现我们现有认识的文字或许可以起到标记性的作用。至于这个文化层堆积的厚与薄，埋藏物的多与少，内在遗存价值的大与小，只能由后来的发掘者评价。

汉武帝时代置河西四郡，为丝绸之路的开通提供了保障。这一历史变化，可以说是东西文化交流史和世界文化进步史的幸事。张骞通西域之后，就人员往来和文化的交流而言，据《史记》卷123《大宛列传》记载，对于西域国家，“汉因使使赂赐以镇抚之”，又“汉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外国，求奇物”。“西北外国使，更来更去”，“而汉使者往既多”。当时形势，如《盐铁论·力耕》言“异物内流”时所谓“騾驴駝，銜尾入塞，騊騊騊，尽为我畜，騊貂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国外有的汉学家评价当时西域丝绸之路开通的意义时，曾经指出：“其在中国史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美洲之发现在欧洲史上的重要。”^①新疆罗布泊地区出土的汉锦图案中“登高明望四海”的文字，以及汉镜铭文“宜西北万里”等，都体现了当时汉人面对世界的雄阔胸襟。而以中原为重心的汉文化对中亚地方的影响，同样有许多例证。这样的历史进步，是在河西成为农耕基地、军事基地和贸易基地之后发生的。这应当也是本书能够列入商务印书馆这套丛书之中的缘由之一。

① 俄罗斯学者比楚林（Бичурин）语，参见〔苏〕狄雅可夫、尼科尔斯基编：《古代世界史》，日知译，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教材编审处1954年版，第224页。

有一个问题需要做一点说明。本书研究对象的主体之一，是居延汉简。居延地方，严格说来并不在通常地理概念中的河西走廊。按照今天行政区划的分割，已属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但是在汉代，这里明确属于张掖郡。《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记载：“张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太初元年开。莽曰设屏。户二万四千三百五十二，口八万八千七百三十一。县十：麟得，千金渠西至乐涓入泽中。羌谷水出羌中，东北至居延入海，过郡二，行二千一百里。莽曰官式。昭武，莽曰渠武。删丹，桑钦以为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莽曰贯虏。氐池，莽曰否武。屋兰，莽曰传武。日勒，都尉治泽索谷。莽曰勒治。骊靬，莽曰揭虏。番和，农都尉治。莽曰罗虏。居延，居延泽在东北，古文以为流沙。都尉治。莽曰居成。显美。”“莽曰居成”颜师古注：“阾駟云武帝使伏波将军路博德筑遮虏障于居延城。”《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褚少孙补述：“最骠骑将军去病，凡六出击匈奴，其四出以将军，斩捕首虏十一万余级。及浑邪王以众降数万，遂开河西酒泉之地。”《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后汉书》已经多次出现“河西四郡”的说法。《资治通鉴》卷25“汉宣帝元康四年”：“初武帝开河西四郡，隔绝羌与匈奴相通之路，斥逐诸羌，不使居湟中地。”胡三省注：“河西，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本匈奴昆邪、休屠王地，武帝开之，置郡县。”可见，以“居延”归于“河西”，是适宜的。

谨以此书纪念曾经给予笔者诸多学术教诲和研究指导的何兹全先生、田余庆先生、林剑鸣先生、谢桂华先生。

目 录

一 汉代河西社会环境

北边交通与汉帝国的文化扩张 1

西北古代的交通与长城 11

“不和”与“不节”：汉简所见西北边地异常气候记录 20

汉代西北边塞吏卒的“寒苦”体验 29

“居延盐”的发现：兼说内蒙古盐湖的演化与气候环境变迁 45

简牍资料所见汉代居延野生动物分布 55

二 汉代河西社会构成

汉代西北边地的“客” 68

汉代军队中的“卒妻”身份 82

汉代西北边塞军事生活中的未成年人 95

汉代河西的长安人 107

河西汉简“诸陵县”史料 121

三 汉代河西社会生活

“酒”与汉代西北边地社会生活 139

悬泉置《鸡出入簿》小议 153

居延《盐出入簿》、《廩盐名籍》研究：汉塞军人食盐定量问题 161

汉代河西军民饮食生活中的“酱”与“豉” 184

居延女子的婚龄 197

边地未成年人生活 204

居延汉简所见“戍卒行道物故”现象 208

肩水金关疑似“马祿祝”简文 217

四 汉代河西社会身份

行政长官“明府” 229

居延汉简“寒吏”身份 241

居延汉简“粪土臣”身份 248

居延汉简“歌人”考论 259

关于居延汉简“车父”称谓 269

居延边防体系中的“胡骑” 275

五 汉代河西社会控制

额济纳《専部士吏典趣辄》简册释名 282

汉代河西“客”与“客田”管理 287

汉代西北边境的“亡人”及相关行政对策 300

居延汉简“渠率”购赏文书 313

居延发现的“临淮海贼”“购钱”文书 331

居延汉简所见“拘校”制度 342

附录：简牍学与汉代河西社会研究的学术史 361

主要参考文献 406

索引 408

后记 415

一 汉代河西社会环境

北边交通与汉帝国的文化扩张

汉代所谓“北边”，通常用以指代具有大致共同的经济文化特征的北部边地。汉代文献多见“北边”经营的记录。《史记》卷30《平准书》：“天子北至朔方，东到太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史记》卷88《蒙恬列传》：“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汉书》卷7《昭帝纪》：“发军屯西河，左将军桀行北边。”《汉书》卷24下《食货志下》：“天子北至朔方，东封泰山，巡海上，旁北边以归。”《汉书》卷25上《郊祀志上》：“上乃遂去，并海上，北至碣石，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

《汉书》卷69《赵充国传》：“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指出“北边”防线长11500余汉里。《汉书》卷10《成帝纪》：“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其各悉心，惟思变意，明以经对，无有所讳；与内郡国举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可知“北边”与“内郡国”有别，“北边”共22郡。《汉书》卷8《宣帝纪》颜师古注引韦昭曰：“中国为内郡，缘边有夷狄障塞者为外郡。成帝时，内郡举方正，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士。”又提出“内郡”、“外郡”的区分。

汉帝国承受的外来军事压力主要来自北方，汉帝国对外交往的主要方向也是北方。汉帝国外交和军事的主要注意力长期凝聚于北方。通过对“北边”的经营，汉帝国形成了政治威势，扩张了文化影响。而北边交通的建设，对于这一历史形势作用甚为显著。

1. 北边军事与北边交通

在秦汉长城的防务体系中，交通道路对于北边军事局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秦汉帝国致力于却敌开边的决策者对此无不予以特别的重视。

出于战争的需要，北边交通系统具有更完备的结构，不仅有与长城并行横亘万里的主要干线，也包括出塞道路和与内地联系的许多条大道，以及保证北边新经济区正常生产与流通的疏密相间的道路网。^①北边道的建设，对于当时北边地区的经济文化形势，有着突出的作用。对于汉帝国的文化扩张，也有突出的作用。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曾经有亲率18万骑兵巡行北边，向匈奴炫耀武力的举动。《史记》卷110《匈奴列传》：“是时天子巡边，至朔方，勒兵十八万骑以见武节，而使郭吉风告单于。”《汉书》卷6《武帝纪》：“元封元年冬十月，诏曰：‘南越、东瓯咸伏其辜，西蛮北夷颇未辑睦，朕将巡边垂，择兵振旅，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亲帅师焉。’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威震匈奴。遣使者告单于曰：‘南越王头已县于汉北阙矣。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亟来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为！’匈奴薳焉。还，祠黄帝于桥山，乃归甘泉。”

汉武帝“巡边垂，择兵振旅”，汉武帝的车列和大队汉军铁骑经过北边道路。这一行为，促进了北边防务，也推动了北边交通建设。

汉武帝“径千余里”北行途中“风告单于”语，既是政治宣传也是军事警告，同时也体现出北边交通对于汉帝国文化扩张的意义。

2. 河西四郡的设置与丝绸之路的开通

北边交通体系的左右两翼，对于汉文化影响的扩展有重要意义。

① 王子今：《秦汉长城与北边交通》，《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

汉武帝时代，在名将卫青、霍去病统率军队远征匈奴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西汉帝国相继于浑邪王、休屠王故地设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长城防线即所谓“北边”于是延伸至河西。河西长城的建设作为军事政治的保障显示出突出的效能，张骞之后，丝绸之路得以开通。中原同西域之间的密切往来，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现象。而这一历史进步，与北边交通建设有密切的关系。^①

湖北鄂城出土汉镜铭文可见有“天王日月上有东王父西王母主如山石宜西北万里富昌长乐”字样者。其中所谓“宜西北万里”，体现出当时人们对西北方向特别的文化关注。如果以此语概括当时社会的移民方向的主流，可能也是适宜的。这一情形，是以北边交通向西端延伸为条件的。

《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记述：“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隔绝南羌、匈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黍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此政宽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在“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的匈奴故地，农耕经济发展至于“风雨时节，谷黍常贱”，除内地移民带来先进农业技术之外，又有“吏民相亲”，生产关系“有和气之应”，“政宽厚，吏不苛刻”等因素的作用。

通过甘肃武威磨咀子48号汉墓出土的西汉木牛犁模型以及陕西绥德王得元墓汉画像石牛耕图、陕西米脂汉画像石牛耕图、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壁画墓牛耕图等文物资料^②，可知牛耕已在北边地区得到推广。由上述资料，可知当地使用的犁架由犁梢、犁床、犁辕、犁衡、犁箭组成，作为畜力犁的主体部件均已具备。辽宁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出土的巨型犁铧，据推测可能

① 参见王子今：《汉代河西长城与西北边地贸易》，载《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 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磨咀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12期；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合编：《陕北东汉画像石刻选集》，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合编：《米脂汉画像石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3期；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编：《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是用数牛牵引的开沟犁^①，可以体现当时北边地区对于水利灌溉事业的重视。《史记》卷29《河渠书》写道：汉武帝塞瓠子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据《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记载，敦煌郡冥安县，“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其泽，溉民田”。又龙勒县，“氐置水出南羌中，东北入泽，溉民田”。《史记》卷110《匈奴列传》：“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②

以水利建设为基础的农耕经济，曾“稍蚕食”畜牧区地域，使农业区与牧业区之分界逐渐向北推移。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③。居延汉简所见“田卒”、“治渠卒”诸称谓，可能即此次北边经济开发事业的文字遗存。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中畜圈邻近厕所，内中多积有粪肥^④，说明当时所谓“务粪泽”^⑤的农田施肥技术已经推广至北边地区。居延汉简中可见有关“运粪”的内容，如：“□以九月旦始运粪”（73.30）。居延汉简又可见所谓“代田仓”（148.47，273.14，273.24，275.19，275.23，543.3，557.3，557.5A，557.5B），许多学者据此以为，中原先进耕作方法“代田法”当时已经在北边推广。

3. 辽东：北边东段与河西对应的军事格局

秦始皇、汉武帝的政治实践中，都透露出一种海恋情结。^⑥其“并海”巡行的壮举，也反映了对燕、齐文化的特殊重视。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出巡，“之碣石”，“刻碣石门”。辽宁绥中至河北秦皇岛沿海地区发现多处规

① 黄展岳：《近年出土的战国两汉铁器》，《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

② “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或断作“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

③ 《史记》卷30《平准书》。

④ 东北博物馆：《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⑤ 《齐民要术》卷1《耕田》引《汜胜之书》。

⑥ 王子今：《史记的文化发掘：中国早期史学的人类学探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2—230页。